

朱家驊對教育的貢獻（上）

● 王 聿 均（史學家，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）

留德博士政壇崢嶸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「九一八事變」發生之後，日本的侵略，得寸進尺，中國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憂患；也就在同時，國民政府從事各方面的建設，不僅物質建設有長足進步，國人在精神方面也漸趨一致，奠定對日抗戰的基礎，故有「黃金十年」（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三七）之稱。而精神建設方面則以教育建設為主。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抗戰軍興，平津京滬相繼不守，戰區日益擴大，教育界部分人士，頗有主張變更教育制度，以配合戰時需要者；國府詳加考慮，認為抗戰既屬長期，各方面人才，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，為自力更生、抗戰建國並進之計，原有教育必須維持，即令各大學遷移後方，並設立國立中學，收容戰區學生。因此各級教育，仍能逐漸發展，並未停止進步。

當抗日戰爭接近勝利之時，教育部已擬具復員計劃。對內遷各級教育文化機關，和邊疆教育、僑民教育之復員，並光復區、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之如何接收改組，教職員學生如何甄別審定

等，皆有詳細之研議。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正式向交戰國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消息到達重慶之後，全國歡騰，教育界人士，更為興奮。教育復員工作，遂即逐步展開。經過八年長期戰爭之後，收復區百廢待舉，復興各級教育，尤屬經緯萬端。而整頓學風，平息學潮，更為刻不容緩。所以從民國二十年到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這整整十八年的期間，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階段，在教育發展上，有不少的進步和創新，也遇到不少的問題和困難。在此時期，朱家驊曾兩度擔任教育部長，主持教育建設大計，貢獻甚多。

朱家驊（一八九三——一九六三年）字驥先，浙江吳興人，同濟醫工學校工科肄業，德國柏林大學地質學博士。在他三十五歲的英年，初入政壇，從此一帆風順，歷任政治、黨務、教育、學術各方面的要職。因學識淵博，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，故用以治事，頗著績效。於政治方面，曾任廣東、浙江兩省民政廳長，浙江省府主席、教育部長、交通部長、考試院副院長、行政院副院長及總統府資政。於黨務方面，曾任國民黨

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長，兼代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，後又調任組織部長。於教育學術方面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、中山大學教授、副校長、校長，中央大學校長兼任中英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董事長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、代理院長。晚年復致力國民外交的工作，主持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，闡明聯合國宗旨及國家基本政策，並促進國際合作。總之，朱氏的貢獻是多方面的，本文僅就其兩任教育部長時期，對教育建設的推動和建樹，加以論列。並由此可窺時代的憂患正可促進國家的建設。多難興邦一語，從抗戰前後中國教育在各方面所獲得的突破來看，尤可發現其積極的意義。

初長教部抱負宏遠

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卅日，教育部部長李書華辭職，國府特任朱家驊為教育部部長。是時蔣中正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職，離京返浙江奉化故里。國府主席由林森繼任。內閣旋即改組，以孫科為行政院院長，並由中央政治會議議決，任李文範為內政部長，陳友仁為外交部長，何應

欽爲軍政部長，陳銘樞兼交通部長，朱家驊爲教育部長，羅文幹爲司法行政部長，陳公博爲實業部長，葉公綽爲鐵道部長。定於民國二十一年元旦就職。朱家驊則由京赴滬，於請示蔣中正先生後，暫未就職。教育部由政務次長段錫朋暫行代理部務。

一月二十八日滬戰爆發，局勢頓起緊張，蔣、汪連袂入京，共赴國難。翌日，行政院再度改組，准孫科辭院長職，由汪兆銘繼任，宋子文爲副院長兼財政部長，羅文幹爲外交部長，何應欽爲軍政部長，朱家驊爲教育部長，顧孟餘爲鐵道部長。朱以時遷勢異，即自其故里湖州返京，於二月二十日到教育部視事。其人事安排，以段錫朋（書貽）任政務次長，顧樹森爲普通教育司司長，郭心崧（後由沈鵬飛繼任）爲高等教育司司長，高廷梓爲社會教育司司長，許炳堃（潛夫）、羅壽衡爲秘書，沙文若（孟海）爲機要秘書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朱家驊調長交通部，任翁文灝爲教育部長。十二月初旬，翁文灝正擬來教育部接事時，未料在京杭國道上車禍受傷，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，始終未曾就職，仍由朱家驊兼部長。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，王世杰接長教育部的命令發表，於月底辦理交接。所以朱氏首任的任期，應算至此時爲止。前後共計一年又四個月。朱家驊初任教育部長，是有著極大的抱負的。他認爲：「自清世正式頒佈學堂章程以來，亦既三十有餘年矣。……雖回顧曩昔，已多進步，然去理想之計劃，復平尚遠，不容諱言。縱之，各科專門人才之缺乏；橫之，平民教育之未普及

；細之，一事一物之猶仰給他國；大之，民族精神之未發揚光大；若涉高岡，今茲僅在中途而已。抑更有進者：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僅得其下。此言摹仿之不足部也。吾國新教育，已在設施，或徑法歐美，或轉採日本。語其實際，蓋皆出於摹仿，擇善而從，原無間然。惟是種族不同，民情殊異，歷史背景，尤遠不相拚。吾國人宜於摹仿之中，力避苟同之弊，以確立我國之特殊教育，其理至明」故他的具體辦法有二：一、對教育部新頒各種法令及課程標準等，務斟酌國情以爲損益，並本孫中山先生遺教，崇尚民族固有道德，以期恢復民族地位，維持久遠。二、推行短期義務教育及半日二部制小學，以此特殊辦法適應中國環境，以免苟同之誚。朱氏以年餘的時間，在教育方面，多所興革，茲舉其犖犖大者，分述於次。

設編譯館編教科書

「國立編譯館」之設立：教育部原設有「編審處」，民國十七年蔣夢麟任部長時，由政務次長馬紱倫（夷初）全權辦理，但外間對審查教科書一事，頗有煩言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國民黨中央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（簡稱「三中四全」）時，朱家驊提議「設立編譯專處總領譯事」一案，經大會決議通過，交國府採擇施行。及朱出任教育部，編審處長一職，已由政次段錫朋派辛樹幟擔任。辛曾任中山大學生物系主任，常識豐富，國學根柢亦深，頗能勝任。朱氏乃決定將編審處獨立，改設「國立編譯館」，以辛

樹幟爲館長，並在行政院院會上正式提議。當時國難當前，政府一度西遷洛陽，部會經費暫發三成。故即以三成經費一千五百元作爲編譯館開辦費，賤賤之數，不敷遠甚；經鐵道部長顧孟餘同意按月補助五千元，問題始獲解決。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，國立編譯館正式成立。即在編譯館原址辦公。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教育部擬定「國立編譯館組織規程草案」，四月十四日，經立法院修正通過，改爲「國立編譯館組織條例」，旋經國府公佈實行。該館初僅設文書、事務兩股，正式成立後，續聘童冠賢、陳可忠、劉英士、鄭鶴聲、周邦道、朱悞等十八人爲專任編譯，並依學術性質，設人文、自然兩組，童冠賢兼人文組主任（後改聘周其勳），陳可忠兼自然組主任。於館務行政則設總務處，分文書、會計、庶務、圖書四股。並設館務會議，由館長及各組處主任組織之。設編譯與審查兩會議，以全館專任編譯及編譯組織之。又設出版委員會，陳可忠爲主任委員，李貽燕、蔣復璁等爲委員。此外，附設圖書評論社，以劉英士爲主編。規模粗具。該館的任務，爲編譯新書，審查中、小學教科書，尤注重於科學名詞的編訂，科學名詞的劃一，對科學的發展，有莫大的關係。自成立迄二十二年六月止，所編譯圖書及訂正譯名之出版品，計有短期小學課本，特種國文讀本，藥學名詞、經濟學原理，格式塔心理學等十六種；已付印者有天文學論叢等五種。審查之教科圖書，計有中學用者十七種，小學用者二十一種。該館基礎之奠定自此始。朱家驊對於編譯館翻譯科學名詞，特別

重視。他認為現在科學圖書，稍涉高深者，必須仰賴外國書籍，於學生研究科學，極不便利。此雖因不重譯述之故，但譯名之難，亦一大原因。故欲獎勵翻譯，介紹外國學術，充實中國書籍，使中國自有其學術，非從譯名做起不可。現在科學名詞，往往一字數譯，至不統一，為劃一譯名計，尤須制定標準譯名。故教育部督率編譯館積極從事這方面的工作，務求科學譯名，歸於統一，而為發展文化之資助。此點正是朱家驊高瞻遠矚的地方。

制訂基礎教育法規

釐訂各項教育法規：例如小學法（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）、中學法（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）、職業學校法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）、師範學校法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）等，都是在這個時期釐訂並公布的。而「中小學課程標準」，則係普通教育司長顧樹森草擬，由朱家驊親自訂定。可見他如何重視基礎教育。茲分析其要義。

建築民族下層基礎在於普及教育，義務教育與小學教育均為普及教育之要圖。近世國家欲謀教育普及，必須推廣小學教育使成義務教育；但中國社會經濟、地方財政，極為困窘，情形特殊，並非一蹴可幾；義務教育與小學教育，乃不能併為一事，必須循序漸進。「小學法」規定小學修業年限六年，前四年為初級小學，後二年為高級小學。小學學級用單式編制，但有特殊情形者，得用複式編制。在初級小學，並得用二部或單

級編制。半日二部制小學即以此為依據。教育部又頒布「第一期實施義務教育辦法大綱」及「短期義務教育實施辦法大綱」，前者係規定初級小學為義務教育，以期分年分區，先之以實驗，繼之以推行，使將來初級小學，普遍設置，成為義務教育。後者係為三十餘萬鉅數失學兒童作急切之救濟，將義務教育年限縮短為一年之短期小學，純採分班制，課程以識字為目的，故特別簡易。此項辦法，推行困難。到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，朱家驊雖早已辭卸教育部長，仍在中央四屆五中全會提出「實施義務教育標準兼治辦法提案」，大聲疾呼，主張限期實施一年制短期義務教育，對十歲至十六歲年長失學兒童，實行強迫教育以治標。推廣普及小學教育，並切實推行半日二部制以治本。由此可見朱家驊鍥而不捨的精神。

「中學法」與「小學法」同日頒布；其宗旨為發展青年身心，培養健全國民，並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從事各種職業之準備，分初級中學及高級中學，修業年限各三年，由省或直隸行政院之市設立之。但按照地方情形有設立中學之需要，而無礙小學教育之設施者，得由縣市設立之。當時中學教育係採取普通中學、師範、職業教育合併設置之制度，初中三年得兼設職業科，高中三年得分設普通、師範及職業各科，此種制度使中學教育系統混淆，目的分歧，其結果中學教育固無從發展，而師範教育與職業教育亦流於空泛。新的中學法適可糾正此弊。將師範教育與職業教育完全劃出於中學之外，俾高中與初中切實銜接以養

成健全國民，兼作升學之準備。而「職業學校法」和「師範學校法」亦同日頒布。前者規定職業學校之宗旨，在培養青年生活之知識與生產之技能。分為初級職業學校和高級職業學校，以單科為原則；但有特別情形時，得設數科。後者規定師範學校之宗旨，以嚴格之身心訓練，養成小學之健全師資。師範學校修業年限三年，其附設之特別師範科一年，幼稚師範科二年或三年。如此使職業教育切合社會實際需要而自成系統，以示注重。內部之設備，尤重實習，俾與教科份量均等。使師範教育重新恢復其獨立地位，專由公家設立，提高程度，施以嚴格訓練；並厚其待遇，以示優異。

修訂學校課程標準

「中小學課程標準」，在朱家驊尚未出長教部之前，已由普通教育司長顧樹森草擬，於二十一年三月初旬，送請朱氏公佈。朱發現其中問題甚多，文字上前後也不配合。須詳加研議，慎重從事。即聘伍叔儼、辛樹勳、沈剛伯等重行審查，最後由朱氏親自訂定，秘書許潛夫亦提供不少意見，文字上則由伍叔儼加以整理。此一新課程標準，於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，正式公布。計分三部分：一為高級中學體育、國文、英語、算數、生物學、化學、歷史、音樂各科課程標準；二為初級中學體育、衛生、國文、英語、算學、植物、動物、化學、歷史、勞工（工藝）、音樂各科課程標準；三為幼稚園及小學課程標準。翌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朱家驊再向國府提

案，建議「編纂中小學教科書」，其理由為貫徹復興民族，厲行課程標準，樹教科書之範本等三點，以與前案相配合。教科書雖不必採國定制，但政府編纂一套新教科書，用以示範，確有積極指導之作用。並提出經費預算和具體進度，由普通教育司與編譯館會同辦理。朱氏於小學課程主張採用注音符號，以期收推行國音國語、統一全國語言之利。於中學課程新標準中，設公民科，以為公民訓練中心科目。初中之基本科目，為國文、史地與科學常識並重。欲初中學生通曉國情，必須以本國歷史綱要及地理環境之教學為主，以激發其民族觀念與民族感情。至於數理，則養成其科學態度，並增加其應付自然環境之勇氣。高中課程，以國文、史地、數理化、生物、外國語各科為最重要。國文欲使其習於修詞結構，以簡潔文字，清晰條理，自由發揮其思想。史地為各種社會科學之基礎學問，數理化生物各科在使高中學生養成科學習尚與科學頭腦。外國語則用作研習外國學術之準備。僅採英語一種，以其應用較為普遍之故；非有特殊需要，不准增設第二外國語。至於大學課程，雖未制定課程標準，然於其輕重先後之際，亦有原則性的考慮。擬將大學課程分為基本課程與專門課程兩大類，加重前者之分量，並對後者通盤籌劃，統一設置，使無重複，俾能互為選修必修，以節經費而資合理。以矯輕基本專門、先專門後基本之弊。

朱家驊改良各級學校課程，有其一貫性的原則，處處由淺入深，由簡入繁，由基本而專精，因為他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，所以特別尊重學術

體系，不致本末倒置，輕重失偏。他在各級學校課程的安排上，煞費苦心，所建立的規模和架構，影響至深至大。特別是對於文史和數理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，同樣重視，既不蔽於人，又不蔽於天，識人知物，乃學校教育培育青年之終極目標。朱氏在這方面的貢獻，是極為卓越的。

充實各大學圖書館

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間，各大學學潮迭起，或由於時局的因素，或由於人事之不協。在南京之國立中央大學，即為一例。因校長人選迄未解決，教職員學生咸不能安定。朱家驊長教部後，亦為此問題所困。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，行政院議決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暫行代長中大。

二十九日段即赴校接事，學生發生誤會，加以歐風，風潮擴大，朱家驊引咎辭職經慰留。行政院商討善後辦法，採取朱氏建議，仿民國十五年國府處理中山大學風潮前例，對中央大學下令解散；由教育部成立整理委員會，聘李四光、俞大維等為整理委員。七月二日，教部派員接收中大，教職員重聘，學生聽候甄別。旋李四光辭職，中大整理委員會改組，聘蔡元培、羅家倫等為委員，蔡兼主任委員。在此時期，朱家驊商承中樞的同意，於八月二十六日，任命羅家倫為中央大學校長。九月十日，中大舉行甄別學生考試，十月十一日，全體學生恢復上課。朱知人善任，對羅家倫全力支持，中大遂恢復常態。此外，在上海的國立勞動大學發生風潮，朱氏堅決主張停辦

，並獲得吳稚暉、李石曾的諒解。於二十一年六月九日在行政院提案，將勞動大學於本學期終了時，辦理結束，原有學生轉入其他國立學校，以竟學業。七月十九日，教部派員接收勞動大學，將其經費移作西北農業專科學校的開辦費。六月二十七日，青島大學亦發生罷考風潮，校長楊振聲赴京辭職。朱亦立即將其解散，學生重行登記，教職員另行聘請。七月五日，青島大學改為國立山東大學，舊有文、理學院設青島，在濟南添設農、工學院，九月二日，以趙畸（太倬）為山東大學校長。此時教育部已樹立威信，一紙命令，即可貫徹。

朱家驊了解國家圖書館及博物館並非普通的社會教育，而是一種學術研究機構，與研究院和大學同其重要。所以於無錢、無屋、無書、無展品的情形下，成立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和國立中央博物院兩籌備處。二十二年四月派蔣復璁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，並撥教育部北平檔案處存書，及教育部圖書館、北平圖書館復本圖書為基礎，館址設於南京成賢街沙塘園。時值「一、二八」事變之後，政府財政困窘，朱氏以交通部長兼教育部長的關係，由交通部每月津貼該館二千元。同時派傅斯年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（後由李濟繼任），經費每月暫定三千元，由財政部照撥。復由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三百萬元，作為這兩個新設機構的建築費。此外並擬籌設「中央教育館」，俾專司蒐集國內外教育圖書、成績、表冊、儀器、標本、模型、照片及各種有關於教育之材料，以供全國教育界之研究參考。惟因朱

氏旋即去職，此一計劃，終未果行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十一月二十日，中央臨時常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會，分別決議，調整中央機關人事，以朱家驊代陳立夫為教育部長，陳則調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。二十三日，朱辭去考試院副院長職，專心主持戰時教育。抗戰勝利後，內閣兩次改組，朱仍辦聯教部。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孫科宣佈新內閣組成，以梅貽琦任教育部長。朱家驊僅為政務委員，始得卸仔肩。計其第二次教育部長任期，前後共四年又一個月。

戰時照顧師生生活

朱家驊重掌教部，正值抗戰已進入第八個年頭，勝利雖已在望，而當時猶在最艱苦的階段。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，朱偕秘書主任劉英士，總務司長賀師俊，專門委員萬紹章（旋調人事處長），科長朱傳鈞等到重慶青木關教育部接事。部內剩餘的經費甚少，一時無從措手。人事安排以趙太侗為高等教育部司長（未到職前由參事陳石珍兼代），中等教育部司長由曹錫珪任，國民教育司司長由顧樹森留任（三十五年九月退休，吳研因繼任），社會教育司司長暫由顧樹森兼代，後由黃如今擔任，蒙藏教育司司長由彭百川留任，三十四年一月，由凌純聲繼任。朱就職後，經旬日的深思熟慮，認為中國各級教育文化機關，遭日本侵略，備受摧殘，而有曠古以來整個教育文化之大遷移。戰時全國教育科學文化界人士，冒危難，耐勞苦，以僅有之貧乏物資，以適應教育

上之需要，其堅苦卓絕，誠足動國際觀聽。然實際困難，則必須設法解決。因於接任一星期後，即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在教育部紀念週上，作首次的報告，說明其施政之重點。略謂：此次重長教部，所特別注意者有六事：(1)戰時物質條件，困苦欠缺，影響精神之安定。目前應先謀教育事業的安定，以安定教職員及學生的生活為始。(2)知識青年從軍，關係抗戰前途至鉅。故必須於短期內積極推行，普遍展開。(3)目前急需措置之事，為安頓戰區學校學生；又留在敵後之青年，報國心切，應繼續設法招致，妥速處理。(4)抗戰以來經費拮据，交通困難，各級學校書籍、儀器、藥品等設備欠充實，當力謀質的增進。(5)尊重學術與學人之風氣，必加以培養。(6)促進國際學術合作，除英、美外，對法、蘇及其他同盟國家的學術合作，亦寄厚望。上述的教育方針，不僅切合於抗戰時期之特殊環境與需要，而且對教育學術的百年大計，特別重視，預為規劃。惟三十三年下半年中原戰事和湘桂戰事失利，這些地區的學校，損失甚大。朱氏接事前後，正值日軍進陷獨山、貴陽吃緊之時，於是「應變」即成為教育部的第一件工作。翌年（三十四年）一月廿六日，日軍陷曲江，中山大學自坪石撤退，兩廣地質調查所的書籍，全部損失。三月，發生豫西、鄂北的戰事，四月，又有湘粵和贛西戰事。幾次大規模的戰役，波及到河南、陝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廣東、廣西、江西、貴州等省。在這些戰區中，學校之向安全地帶遷移，員生之安頓與救濟，工作俱極繁劇。從一月至五月，教育部招致的

戰區學生已達三萬七千人，六月份，亦有五千餘人。大批戰區青年，突然湧到，有時難免措辦不及。例如自河南退至陝西境內的學生，約近兩萬人，除設立「河南聯合中學」可收容八千七百餘人外，在陝西設置招訓機構收容三千二百餘人。另擬在陝西設戰時中學二所，進修班二所，訓導所二所，期能增收六千餘人；因未准撥款，故延緩成立。朱氏對於收容戰區學生，甚為焦急，因錢不湊手，倍感困難。教育部全年經費僅六十萬，在國家總預算中佔百分之三。而員生膳食及生活補助費、米貸金等即達五十萬，佔教育經費百分之七十五強，可說四分之三的費用，都用於員生膳食。而物價上漲不已，教員生活仍然清苦，學生營養仍然不良。主其事者，頗有力不從心之嘆。戰時情形特殊，學校設備簡陋，補充困難，二十九年陳立夫任部長時，曾撥美金一百萬元，向美購置圖書儀器，為時數載，尚未到齊。朱再撥英金二十萬鎊，美金四十三萬元，分向英美訂購圖書儀器，以供專科以上學校之用。至於中學方面，教部及後方各省，均設有科學儀器和博物館本製造所，自行製造，惟數量仍不甚敷用。但在極度艱困中，各級學校大體均能循序漸進。到三十四年七月為止，高等教育方面，計有大學四十所，獨立學院五十所，專科學校五十五所，學生七萬餘人。中等教育方面，包括中學、師範及職業，計有三千四百餘校，學生約一百一十萬人，其中國立學校九十九所，學生五萬餘人，多數均係戰區學生。國民學校則依照鄉保制度設立，後方十九省市設國校二十六萬五千餘所。朱

氏於極力解決各項困難問題之外，亦作了不少積極的興革。對小學國定教科書及課程標準問題，尤為注意。因小學教科書錯誤百出，而民國二十一年所定的課程標準，事隔十餘年，已不能完全適用，特指定藍田師範學院、西北師範學院，以及浙大和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，加以徹底檢討，簽註意見，再由教部彙合研討，以備修訂一個完善的課程標準。其次為對音樂的倡導，此時國立音樂學院已在青木關設立，朱氏商請該院院長吳伯超，在校內附設「音樂幼年班」，招收學生二百名，全部官費，九年卒業。除音樂之外，並着重文藝訓練，俾養成天才音樂家，為中國音樂奠立良好基礎。此校戰後遷設常州。

教育復員計劃周詳

當抗日戰事接近勝利之時，教育部為配合整個復員計劃起見，曾擬具教育復員計劃十二項，對內遷各級教育文化機關之復員，邊疆教育及僑民教育之復員，並光復區、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及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如何接收改組，教職員學生如何甄別審定，日偽奴化教育如何清除矯正，均有詳細規定。該計劃正由中央設計局彙案整理之時，而勝利消息，忽然到達。朱家驊及履及的於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對大後方教育界、學術界、文化界同仁廣播，慶祝勝利，歡迎和平。對大家戰時的艱苦卓絕，備極稱讚，認為「這段的輝煌戰績，雖不在沙場之上，而在茅舍裏面，却將永為歷史所稱道，後代所追念。這是一種道德的測驗，意志的鍛鍊，古今中外，未之有也」。

並勉大家憑此基礎和精神，從事建國工作；注意原子炸彈及其背後所依的一切學術，力求充實各級教育，迎頭趕上。八月十七日晨九時，又向前方廣播，題為「奉告前方教育文化界人士」，對曾在陷敵區域歷盡折磨艱辛而內心忠於國家的教師們，表示感謝；對由於環境束縛，潛伏或隱避在淪陷區或偽政權內的教育文化工作者，忍辱負重，盡瘁職守，政府自當加以延致；而少數甘供驅使為虎作倀的文教界敗類，自應受國法的嚴厲制裁，不容絲毫有所假借。因提出四點，促使注意：(1)曾經陷敵區域的中學小學，必須照常上課，不可一刻停頓。(2)所有一切在曾經陷敵區域的學校及文化、學術機關，不論在怎樣情況下，必須負責保存校舍、校產、圖書儀器，不得有絲毫損壞。否則，必受應有懲處。(3)東北各省在敵十四年來籍制下的學校，其負責人必須照常維持，靜待查考調整。(4)台灣、澎湖列島的學校、文化以及學術機關，須依國際法及國際慣例處理；但在這區域的教育文化人員，必須保持其工作，以待接收辦法的實施。這四點甚為簡單扼要，清楚的對收復區和光復區的教育文化機關，加以指示；囑其保持原狀，靜待接收。一面又電頒「戰區各省市教育復員緊急辦理事項」十四條，請各省市政府轉飭教育廳局遵照辦理教育復員工作。立即派員接收敵偽各級教育文化機關（公立劇院、電影院在內），應儘先接收其檔案；並調查公私古物文獻損失情形。其次應即組織甄審委員會，甄審教育行政人員、學校教職員與社教人員；並對收復區學生予以正確思想之訓練，銷

毀敵偽教科書及一切宣傳品。同時又在各收復區分設「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」，協助各該區教育當局辦理善後工作。

盡心竭力解決難題

朱家驊對於全國教育善後和復員之各項問題，頗費心血。如遷移後方教育機關的復員問題，收復區和光復區教育的整理問題，留在西南西北各級教育機關的繼續發展問題，參加抗戰工作青年及失學青年之就學復學問題等，必須通盤籌劃，尤須集思廣益，共策妥善之解決。八月二十七日，教育部「教育復員計劃委員會」議決於九月二十日在重慶召開「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」，並推定傅孟真、羅家倫、王雲五、黃炎培、梅貽琦、任鴻雋、劉季洪等二十一人與教育部部長及各司長為籌備委員。

九月六日，成立大會秘書處，以國民教育司司長黃如今，擔任秘書長。此次會議出席者一百九十一人，計教育部政次朱經農、常次杭立武等二十一人，中央各部會代表金寶善等二十人，國民參政會代表莫德惠、江庸、左舜生等五人，中央研究院代表薩本棟、丁燮林等三人，國立北平研究院（李書華），故宮博物院（馬衡），國立編譯館（陳可忠）等六文化機構代表各一人，公立大學校長梅貽琦、王星拱、劉季洪、黃季陸、吳有訓、周鯉生、竺可楨、章益等三十一人，獨立學院院長李蒸等三十一人，專科學校校長魏元光等五人，各省市教育廳局長郭有守、英千里等三十五人，國立中等學校校長胡秉正等五人，教育

部遴選專家羅家倫、陳大齊、沈宗瀚、許德珩、李石曾等四十人，其他十五人。已集當時教育學術文化界之精英。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半，會議在中央圖書館揭幕，各院部會首長戴傳賢、翁文灝、陳立夫等暨出席會員，來賓共三百餘人。朱家驊以大會議長身分致開會詞，說明世界經過這次戰爭的劇變，人類的時空觀念已完全改觀，其影響於社會思潮及文化教育者，至為深刻；中國再不能抱殘守闕，我們的教育任務，在如何促成和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。今天談百年樹人大計，要求普及教育，也要求高度教育，要著重實用，也要特別加強純粹科學的研究。教育的復員並非「還原」。站在國家民族教育文化均衡發展的立場上，對所有學校及文化機關，應注重其地域上合理的平均分佈，以改變過去的畸形狀態。至於日人在侵佔區域的奴化教育政策，尤為毒辣，一般民衆於不知不覺中受敵偽麻醉，在所難免。故在收復區和光復區內如何肅清敵偽奴化教育的流毒，而逐漸恢復正常教育，尤為重要的課題。前、後方直接間接參加抗戰工作及因戰爭而失學的青年，為數甚鉅，應如何予以鼓勵救濟，使其獲得就學和復學的機會，亦係刻不容緩。這些問題，胥賴大家殫精竭慮，共謀解決。他提綱挈領的說明了開會宗旨後，會議分五組進行，至九月二十六日上午，舉行閉幕式。除二十三日為星期日，休會一天外，共計六日，分組審查議案的時間，則為四日。決議的議案，共分五大類：一為關於內遷教育機關之復員問題。包括專科以上學校、研究機關、國立中學、社教機關等之復員。二

為關於收復區教育復員與整理問題。包括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處理辦法，中等學校教職員甄審辦法，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審辦法等項。三為關於台灣區教育之整理問題。包括接管台灣教育的具體規劃，舉辦台灣區教育人員訓練計劃等項。四為關於華僑教育之復員問題。包括南洋華僑教育復員計劃，及南洋僑校師資之甄訓與培養等項。五為關於其他教育之復員問題。包括戰時服役學生復學及轉學辦法，提高小學教員待遇，舉辦中小學師資訓練班以適應戰後需要，要求日本政府應賠償我國教育文化損失等項。以上各議案，包羅萬象，已擬定了戰後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。

會中決議要把收復區各地學校，納入正規教育，意即在各各地辦理臨時大學先修班三個月，學生

經甄審及格，追認畢業資格，由教育部發給文憑。九月底，朱家驊已派出赴各地之「教育特派員」，蔣復璁為京滬特派員，王書林接收南京各校，並以中央大學為主體，辦理南京各大學先修班，李壽雍接收上海的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，辦理上海各大學先修班。平津特派員為沈兼士，陳雪屏接收北京大學，並以北大為主體，辦理平津大學先修班。武漢特派員為辛樹幟，兼辦武漢大學先修班。青島特派員為王季高，由其接收山東大學，並辦青島大學先修班。臧啓芳為東北特派員，同時接收東北大學。各地先修班結束的時候，王書林在南京不能服衆，糾紛最多；而上海環境複雜，李壽雍却應付裕如，成績最佳，所用經費亦最省。

聖文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

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篇篇可讀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。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